

唐 刘知几撰 赵吕甫校注

史通新校注

重庆出版社 出版

上古之書有三坟五典
索九丘

八卦之說謂之索求其義也又雲九州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其次有春秋
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乘

漢以下其流漸繁大抵

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

主魏氏春秋穉漢魏尚

書

漢魏浦雲一脫魏字宋本脫餘本作隋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王之籍

三皇之簡為三坟五帝之策為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

唐 刘知几撰 赵吕甫校注

史通新校注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心富
封面设计 剑 歌
技术设计 寇小平

[唐]刘知几撰 赵吕甫校注
史 通 新 校 注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36.375 插页2 字数1044 千
1990年 8 月第一版 1990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400

ISBN 7-5366-0505-6/K·33

(精装) 定价: 16.00元



赵吕甫教授近照

自序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一位巍峨超群的史学家、思想家。他一生修撰过大量当代的重要历史文献，替后来官私编著纪传体、编年体的唐史，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参考资料；还撰著了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为后世修史工作提示了不少足资取法的设想。

刘知几字子玄，唐朝徐州彭城（江苏徐州市）人，出生于高祖武德元年（661），卒于玄宗开元九年（721），享年六十一岁。

刘知几出身于世代“簪纓之家”，韶髫之年，就接受乃父刘藏器教诲，吟诵群经古史。当他诵读《古文尚书》时，深感其文辞艰涩，殊难成诵，常常遭到捶挞。但当他侧听乃父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时，辄欣然废书谛听入神。藏器奇其志，遂给以改授《左传》，期年而讲授都毕。于是刘知几又进而泛览《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下至本朝的列代实录、记注，对这些许多史著“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自叙》）他都能大致领会到。

在社会风尚讲究仕进的唐代，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刘知几，自然也是不会忘情于功名利禄的。他二十岁时，遂及进士第，并任获嘉县（河南今县）主簿。平时除经办官务外，仍勤勤恳恳攻读史籍，“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莫不钻研穿凿，尽其

利害，”（同上）这就为他后来参纂国史、实录，编撰《史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刘知几调充定王府仓曹，兼任《三教英珠》这部大型类书的编辑工作。《英珠》杀青之翌年，唐政府任命刘知几以著作佐郎参预国史的修订活动，从此他便正式担任史官了，时年四十二岁。旋迁任左史，参修起居注。嗣复奉旨与朱敬则、徐坚、吴兢等人修撰成《唐书》八十卷。长

（704），刘知几升任中书舍人，史职暂停。中宗即位，刘知几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国史仍旧。神

（708），他和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录》三十卷。景

（708），又奉诏主持国史编修事宜，并迁秘书监。

那时史馆的修纂工作，例由权臣以“监修国史”的名义领。一时如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处客、萧至忠凭恃特权地位，对修撰国史的具体工作横加干涉，而史官们须仰承监修的意旨，莫能充分施展自己的学识才智，从事例如在《武后实录》的编纂过程中，刘知几曾经提出过许多合理化主张，却都遭到武三思等人的百般刁难。刘知几虽则迫于境，不得不“与俗浮沉”“依违苟从”（同上）了，但仍旧“为史官所嫉”（同上）。触处荆棘的环境，使刘知几郁快孤愤，乃笔致书于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萧至忠，坚决请求解除史职。在函中，他鞭辟入里地揭露了史馆所存在的种种弊病：馆内人手杂众，执笔者观望牵延，旷废时日；图书档案封锁难见，保密工作废弛，流言蜚语广泛暗播，史官畏怯迟回；监修大臣意见分歧，史官援笔动感掣肘；修撰任务缺乏明确统一细则，秉笔者徬徨无所适从。凡此批评确实都切中了当时设馆修史的要害，也深刻刺痛了监修权贵的隐私，以至“（萧）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

679/07

“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仇嫉之。”（《忤时》）

景云中，刘知几的《史通》脱稿问世，甚受徐坚诸史学大家交口赞誉，名驰遐迩。唐政府逼于时论，只得任命他为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再度参与修史工作。玄宗开元三年（715），刘知几迁散骑常侍，史职如故。九年（721），他的长子刘颋触犯了刑律，被处分流放远乡。刘知几向执政大臣申辩，玄宗大怒，贬斥他为安州（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他抵达贬所后不久就病死了。

刘知几一生，公务之暇，悉从事博览经史百子，沉潜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贡献最称卓著的，自然应推《史通》一书了，下面就谈一谈它的内容梗概。

自先秦下逮唐初，济济昌昌，史才辈出。至于博综故闻的史籍，又无虑千百种。凡能专通一史的，已属难能可贵，设如贯穿经史百家，洞察古今，并通晓其间利病曲直而又卓然铸成一家之言者，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更是罕觐。

史学评论虽则肇端于孔子、孟轲，他们遗留下来的见解不过寥寥数语而已。秦、汉以降，扬雄、班彪、王充、张辅、葛洪、刘勰诸人偶有论列，遗言也甚简略。因而秦、汉以次千百年间，史学评论发展状况信如涓涓细流，始终未能蔚成巨浸。

刘知几以其卓绝才华，充沛的潜研毅力，回顾了大量前代史著的源流和体例，总结了历代史学发展的趋势，较为公允的评鹭了众多史学家的成绩和缺点，深刻揭示了史书叙事技巧的高下优劣，旗帜鲜明的表彰了某些史家独具匠心的史学主张，从而汇撰成为一部立论精湛、成就斐然的史学理论巨制《史通》。

概括说来，《史通》二十卷分内外两篇：“内篇皆论史家体

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士人得失。”（《四库全书总提要》）若就全书内容的体系而言，则可区分为八组：

第一组包括《六家》、《二体》、《杂述》三篇，缕述诸体史书的渊源流别。刘知几继承更革了阮孝绪《七录》、唐修《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分类法，将纪传、编年、国别等合称为“正史”；将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都邑等十种，统名为“杂史”。他还从史料价值角度分别对两大类史著作了简要评介。刘氏分类法虽未被宋、元间史志所采纳，但对明、清目录学书史部图籍的区分类别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第二组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等八篇，专门研讨纪传体的组织结构，次第评论了《史》、《汉》以下诸史里这些方面问题的优劣得失。他的论难比较平实，为后世修史工作提出了足资取鉴的刍议，但也偶涉偏颇乃至舛谬的说法。

第三组计有《断限》、《编次》、《题目》、《补注》等四篇，进一步阐述了纪传体编纂的若干具体处理方法，是前一组篇章的继续而又略有区异。刘知几力论断代纪传体载事的断限不能泛滥无所约束，编次必须合乎体要，书名篇名应该紧扣内容实际，补注应以能增益纠迪正文内容为宗旨。

第四组合《载言》、《载文》、《采撰》、《书事》、《人物》、《叙事》、《言语》、《浮词》、《模拟》、《因习》等十篇。本组诸篇探索了拣择史料和写作技巧诸问题。刘知几认为史家修史务须旁征博采，慎加选择；述事则应剪裁精审，切忌妄测虚构；录文记言尤宜典雅存真。总之，纪、传、志、表的内容必须力求赡详精核。

第五组为《直书》、《品藻》、《曲笔》、《鉴识》、《探赜》等五篇。本组各篇充分阐述了史家应具有激清扬浊、直书无隐的崇高美德，切忌徇私阿附、沽名渔利；评鹭史籍者，必先明其指归，不当眯目轻事诋诃，哗众取宠。

第六组为《覈才》、《辨职》、《忤时》等三篇，申述铨选史才的重要性与履行史职之举步艰难。刘知几对于设馆修史和监修总知史务两者的弊病进行了深刻揭露与尖锐批判，尽情地阐发了史学领域里一家独断之学的弥足珍贵。

第七组有《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两篇。两篇内容虽属历代史官设置沿革与史书编撰的鸟瞰，但是两篇既表彰了大批良史的卓越贡献，也对一些辞拙而才疏的史著作者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抨击。

第八组为《疑古》、《惑经》、《申左》、《五行错误》、《五行志杂駁》、《杂说》上中下、《暗惑》等八篇。刘知几在这些篇章里，运用了形式逻辑推理方法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武器，深刻细致地揭露了儒家经典与正史、杂记中某些纪事的欺骗性、虚伪性，继承发展了历史考据学的优良传统，对于后世历史文献辨伪工作影响良深。

此外，《点烦》内容是杂举诸史中的一些片段，点刊其间的烦文冗句，以示史传叙事行文应如何提炼推敲始能臻于“文约而事丰”这一理想境地。《自叙》是概述大半生自学历史的经过和撰作《史通》的旨趣。

综上所述，足征《史通》洵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专著。而其影响之深远，又非《论衡》、《文心雕龙》所可比拟。不过，刘知几毕竟是封建社会时代的史学家，囿于阶级思想意识，因此现在看来，《史通》中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迂曲支离，

而悖谬不经之语亦时见内外篇。

明、清以来，校勘评注《史通》者有数家，确也涤荡了不少通读其书的障碍，贡献殊夥。但因时代和学术发展水平的局限，铨解评议似难尽合现在一般读者的需要。本书的注解约六千三百余条，其中校勘记约有二千二百余事，两者行文措辞俱力求通俗易懂，前修时贤的有关校释，悉择善而从。为了替读者节省翻检之劳，本书采用重见重注的办法，必要时方注明别详某篇。本书之作，曾得到先父少咸先生，已故殷孟伦教授忱悃鼓励，受诲良多。自愧学殖浅陋，精力衰退，稿本虽曾数易，错误在所难免，切盼读者多赐教言，俾便异日遵照修改。

一九八七年元月五日赵吕甫志于成都欣庐寄室。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修改于南充市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唐史研究室。

凡 例

一 检视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九、章俊卿《山堂群书考索》卷十五、卢文昭《群书拾补》等所记，宋槧本《史通》曾为数种，但清中叶以后，悉湮没无闻。浦起龙《史通通释》所采用作底本的，便是一种宋代佳刻，殊堪重视。本书正文即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的《史通通释》作为底本。

二 浦起龙董理《史通》，曾参校明、清诸刻，其用力虽颇勤劬，但在校勘方法上则存在着显著缺点：明著版本名称者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皆仅标示“一本作某”、“又一本作某”、“别本作某”、“俗本作某”、“古本作某”，措词含混不清，转令读者困惑。本书曾先后采用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陆深刻本（省称“陆本”）、万历五年（1577年）张之象刻本（省称“象本”）、万历三十年（1602年）张鼎思刻本（省称“鼎本”）；李维桢、郭孔延《史通评释》本（省称“郭本”）、“王本”）、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省称“黄本”）以暨《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所录部分宋本《史通》文（省称“集成本”）校讎，凡此俱标明版刻名称，取便稽覈。

三 《史通》流传经历千禩，重以辗转缮写梓行，讹夺错简，触处皆是，倘不细加勘校，诚未易于卒读。清中叶以来，学者间多致于《史通》文字的校讎，卢文昭除用华亭秦邦宪影抄宋

本校勘“黄本”外，复裒辑冯己苍、钱遵王、何焯诸家校语为一编，收入《群书拾补》中。商务印书馆影印“鼎本”时，附录有孙毓修所辑孙潜夫、顾广圻、邓正閼、姜殿扬诸人校识，他们都各有贡献。本书除了采用以上各家校订外，还搜采到前辈巴县向宗鲁（承周）、华阳林山腴（思进）两先生以及武昌徐行可过录的杨守敬（惺吾）等三家校记，皆未曾付梓，弥足珍贵。本书校注里，除向、林两先生具著姓名外，其它诸家则只著姓氏，不书名号。卢即卢文弨，冯即冯己苍，钱即钱遵王，何即何焯（义门），孙即孙毓修，顾即顾广圻（千里），邓即邓正閼。

四 《史通》引用典实极多，诵读匪易。郭撰《评释》始稍事引证诠释。尔后王氏《训故》、黄氏《训故补》、浦氏《通释》等亦相继有所补证，探幽索隐，对于研习《史通》者实大有裨益。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援引书证，率加点窜；或者仅仅举示书名篇名，如此处理，既不能替读者简省翻检之劳，更难令人领会刘知几用典抒理之遽意。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程千帆《史通笺记》等，又递相补充训解，功力尤为深厚。为了避免重复，本书承用《通释》以上旧注，不再标举书名，读者可自覆按。为了取便读者，本书引用旧籍，力求径举其原文；其有应予节删者，即注以省略符号；引文若有奥句难字，则随文酌增注译。至于毋庸摘录原文者，始撮述典事的大意。

五 《史通》是用骈俪文写成，铸词造句往往使用经史百家陈言。如不挾源疏解，实难妙达刘氏立论的微旨。郭、王以次诸家都能注意及此，读者称便。本书除了对陈言间加补证外，还对艰深词句酌予注译。

六 《史通》所载人物、史著，其生平行迹、卷帙多寡，正

史杂录所述，往往歧出不同。本书博采前修时贤的评议考辨，以明其是非曲直。

七 《史通》是一部史学理论研究巨制，议论宏通，用心缜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其卓越见解，本书在“说明”里概括提示每篇的主题和分段大意，同时还结合各段节所涉及的事件、人物、史籍，酌引诸家评论以洞察刘说的优劣质俚。此外，前代和当代学者的史学专著或论文，其间颇有直接纠迪刘说之未备者；有的虽非针对刘说加以辩驳，却富有参考价值，本书或径录其全文，或摘抄其中的重要片段，又或撮举其要点，附于“说明”末尾，以供研阅。

八 书末所附《新唐书刘知几传注》、前人有关《史通》的序、跋、书后、提要，以供研究者参考。

史 通 原 序

长安二年[1]，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2]，寻迁左史[3]，于门下撰起居注[4]。会转中书舍人[5]，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6]。今上即位[7]，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8]，其兼修史皆如故[9]。又属大驾还京[10]，以留后在东都[11]。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12]，仍迁秘书少监[13]。自惟历事二主[14]，从宦两京[15]，遍居司籍之曹[16]，久处载言之职[17]。昔马融三入东观[18]，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19]，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20]，不遑启处[21]。尝以载削余暇[22]，商榷史篇[23]，下笔不休[24]，遂盈筐篋[25]。于是区分类聚[26]，编而次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27]。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28]，是知史之称通，其来日久[29]。博采众议[30]，爰定兹名[31]。凡为廿卷，列之于左，合若干言[32]。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33]。

注释

〔1〕 长安二年(702)，为武则天统治的第十九年，武周政权建立的第十二年，时刘知几四十二岁。

〔2〕 唐制：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四人，从六品上。《唐六典》卷一〇“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

〔3〕 寻，不久。迁，调动官职。《唐六典》卷八，高宗龙朔二年(662)，改起居舍人为左史，起居郎为右史，从六品上。“起居郎掌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时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于国史焉。”

〔4〕 会，适逢。门下省，起居郎、舍人为门下省属官。

〔5〕 俄，不久。兼领，兼任。

〔6〕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知几于长安四年(704)转中书舍人，时年四十四岁。

〔7〕 今上，中宗李显。即位，指中宗复辟，沿用则天年号神龙元年(705)，时知几四十五岁。

〔8〕 除，任命，授职。《唐六典》卷二六，太子左春坊置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下，为左庶子的副职。“掌侍从、赞相、礼仪、驳正启奏；监省封题。”又《唐六典》卷二七，太子率更寺，令一人，从四品上。“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令。”

〔9〕 浦起龙云：(下省作“浦云”)“旧脱‘兼’字。”又云：“兼修史，以领职言，脱‘兼’字则非”。修史指知几与徐坚、吴兢等参修《则天实录》，时为神龙元年(705)。如故，和过去一样。

〔10〕 神龙二年(706)，中宗自东都洛阳迁返长安。属，跟着。

〔11〕 浦云：“旧脱‘东’字。”徐本脱。留后，官名。

〔12〕 中宗景龙二年(708)，知几四十八岁。专知，专门主持。

〔13〕 《唐六典》卷一。秘书省置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兼领著作、太史二局。

[14] 二主，武后、中宗。

[15] 宦，浦云：“一作‘官’。”徐本作“宦”。

[16] 司籍，掌管图书。曹，分科办事的官署。

[17] 载言，记载，指史官的职掌。

[18]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111)，授马融校书郎中，校订东观藏书。旋因上《广成颂》，陈说文德武功不可偏废，得罪大将军邓鹭，十年不得升调，又禁锢六年。邓太后死，安帝亲政，复召融还郎署，再入东观。桓帝时，又因得罪大将军梁冀，流放朔方。遇赦复为议郎，三入东观著述，见《后汉书》本传。

[19] 张华博闻强识，魏末卢钦言推荐，授佐著作郎，参修国史。晋惠帝即位后几年，任司空，领著作，监撰国史。见《晋书》本传。典，主管，担任。

[20] 思，浦云：“旧误作‘司’。”何焯云：“‘思’字以意改。”徐本作“司”。是用，因此。这句是说因连任修史重务，私心甚感忧虑。

[21] 语出自《诗·小雅·四牡章》。遑，闲暇。启处，安居。

[22] 载，记载。削，笔削。载削，修撰的意思。

[23] 榘，浦云：“一作‘榘’。”卢文弨云：“(下省作‘卢云’)‘榘’，宋本作‘榘’。”

[24] 语出自《文选》曹丕《典论·论文》：“(傅)仲武(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下笔不休，专意撰著，竟无法停止。

[25] 盈，满。筐篚，盛物竹器。这句意谓积稿很多。

[26] 区分类聚，加以分类归纳，有整理成书的意思。

[27]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校书郎杨终奏称：“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后汉书·终传》)于是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讨论五经异同于白虎观。会后作《白虎议奏》，由班固撰集其文。《隋书·经籍志》，《白虎通》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作《白虎通义》。

[28] 《汉书·司马迁传》：“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指《史记》)，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29] 自，黄本同，徐本作“曰”，卢云：“‘曰’，何焯校改‘自’。”

[30] 采，徐本同，卢云：“‘采’，宋本作‘採’。”

【31】 爰，于是。

【32】 旧注：“除所阙篇，凡八万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浦云：“字数今不可定，姑仍旧本存之。”孙铤修云：“张之象本无夹注二十四字，何焯以朱笔补入。”

【33】 中宗景龙四年，即710年。